

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第八卷

國學研究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國朝名臣

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國學研究

第八卷

主編

袁行霈

編委（按姓氏筆畫排列）

王天有	王小甫	王邦維	吳同瑞
孫靜	袁行霈	陳來	鄒衡
程郁綬	趙匡華	趙為民	閻步克
蔣紹愚	樓宇烈	嚴文明	

特約編委

許逸民

北京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一年·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國學研究．第八卷／袁行霈主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10

ISBN 7-301-05246-4

I．國… II．袁 III．國學-研究-文集 IV．Z126.27-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1)第 069365 號

書 名：國學研究（第八卷）

著作責任者：袁行霈 主編

責任編輯：喬 默

標準書號：ISBN 7-301-05246-4/G·0683

出版發行：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澱區中關村北京大學校內 100871

網 址：<http://cbs.pku.edu.cn> 電子信箱：zpup@pup.pku.edu.cn

電 話：出版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4140 編輯部 62752032

排 版 者：北京軍峰公司

印 刷 者：北京大學印刷廠

經 銷 者：新華書店

787mm×1092mm 16 開本 35 印張 800 千字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68.00 圓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本刊之出版，先後承蒙
南懷瑾、查良鏞等先生暨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
作委員會
慷慨資助，特此致謝。

目 錄

試論唐代的詩壇中心及其作用	陳鐵民 (1)
《文鏡秘府論》“證本”考	盧盛江 (31)
見於《永樂大典》的六十一種宋集考	孔凡禮 (87)
汪端的詩歌創作與批評初論	蔣 寅 (143)
“桓”字與真山楚官璽	李學勤 (173)
王仁事蹟與世系考	潘吉星 (177)
隋唐五代時期的生態環境	徐庭雲 (209)
祈雨與唐代社會研究	雷 聞 (245)
《登科記考》補正	孟二冬 (291)
《續資治通鑑長編》神宗朝記事校勘補正	高紀春 (315)
敦煌曆日與當代東亞民用“通書”的文化關聯	鄧文寬 (335)
敦煌先唐詩考	徐 俊 (357)
由功利到信仰——墨子思想重估	趙 峰 (377)
玄學“有無”之辨與士人名教自然之擇	寧稼雨 (411)
王安石的儒學思想	楊柱才 (439)
聶雙江思想研究	楊立華 (467)
二十世紀中國《爾雅》學研究	胡錦賢 (501)
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 2000 年大事記	(543)
徵稿啟事	(548)

試論唐代的詩壇中心及其作用

陳鐵民

陳寅恪先生在《元白詩箋證稿》中說：“苟今世之編著文學史者，能盡取當時諸文人之作品，考定時間先後，空間離合，而總匯於一書，如史家長編之所爲，則其間必有啓發，而得以知當時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競造勝境，爲不可及也。”（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9 頁）指出編著文學史，不僅必須考定作品的時間先後，還要究明創作的“空間離合”，洵爲高見，惜吾人罕有涉足此道者。本文所探討的“詩壇中心”，即屬創作的“空間離合”範疇，由這個問題入手進行研究，或許能給我們以啓發，獲得一些關於唐代詩歌發展規律的新認識。

一

所謂“詩壇中心”，指的是詩人薈萃的中心、詩歌創作和傳播的中心以及詩藝交流的中心。詩壇中心的創作主潮會對整個詩壇產生重大的影響，甚至起着支配的作用。唐時有這樣的詩壇中心嗎？

初唐近百年中始終存在的宮廷詩苑，就是當時詩壇的中心。首先，初唐宮廷詩苑是當時詩人薈萃的中心。整個初唐時代，處在宮廷詩苑圈子以外的詩人數量很少（參見余恕誠《唐詩風貌》第三章）。這種情況的出現，有它的歷史原因。經歷了隋末的多年戰亂之後，唐立國之初的文教事業衰敝，詩人文士凋殘，這對於唐王朝統治的鞏固是不利的。唐太宗說：“朕雖以武功定天下，終當以文德綏海內。”（《舊唐書·音樂志》）要“以文德綏海內”，自然應重視文教建設，而從事文教建設，首先需要大量人才。所以，唐初帝王便多方網羅了一

批前朝遺留的詩人文士入朝，給予高位。這樣，武德、貞觀時的宮廷詩苑也就形成了。這一宮廷詩苑的主力是一批學士。武德四年（621），秦王李世民“銳意經籍，開文學館以待四方之士”（《舊唐書·太宗紀》），令杜如晦等十八人并以本官兼任學士（十八學士的姓名，見於褚亮《十八學士贊》），史稱秦王府十八學士。在這些學士中，有謀臣、經學家、史學家，更多的則是以詩文名世的人，如虞世南、褚亮、于志寧、許敬宗、劉孝孫、薛元敬等。此外杜淹、杜正倫二人（皆有詩作傳世），雖不與十八人之列，實際也曾為文學館學士（據《舊唐書》本傳）。李世民即位後，秦王府不復存在，於是文學館學士便轉成為弘文館學士（據《唐會要》卷五七“翰林院”）。後來，唐太宗又陸續遴選若干文學之士入弘文館，亦并以本官兼任學士或直學士。根據《唐會要》卷六四、《通鑑》武德九年及兩《唐書》本傳的記載，貞觀時新進的學士、直學士有歐陽詢、顏師古、蕭德言、褚遂良、朱子奢、謝偃、上官儀（諸人都有詩作傳留）等。除學士外，武德、貞觀時的宮廷詩苑中，還有一些重臣，如魏徵、王珪、陳叔達、岑文本、李百藥、楊師道、袁朗、孔紹安等。

高宗朝宮廷詩苑的主力仍是一批學士。在太宗朝的一些聲名最盛、影響最大的宮廷詩人已辭世的情況下，許敬宗、上官儀便自然而然地成為高宗朝宮廷詩苑的代表人物。雖然這時許、上官二人皆累官至宰相，但仍都兼任弘文館學士（唐制，學士皆以他官兼任）。據《唐六典》卷八、楊炯《薛元超行狀》及兩《唐書》本傳的記載，高宗朝在弘文館任學士、直學士的尚有任希古、袁承序、李義府、來濟、薛元超、劉胤之、劉禕之、高智周、孟利貞、郭正一、張大素、范履冰、韓思彥等，他們在當時大抵都有詩名或文名，多數人有詩作傳留至今。此外，董思恭、元萬頃、元兢雖非弘文館學士，也可算作宮廷詩苑中人^[1]。武則天、中宗朝宮廷詩苑的主力也是一批學士。武則天在天授元年（690）達到稱帝的目的後，漸熱衷於文事，君臣唱和日盛。聖曆二年（699），置控鶴府（後改為奉宸府），令內寵張易之、張昌宗監領，引文學之士薛稷、員半千、閻朝隱、宋之問等入府為內供奉。同年，命張昌宗召李嶠、閻朝隱、徐彥伯、薛曜、于季子、沈佺期、徐堅、張說、劉知幾、宋之問、崔湜、韋元旦等二十六人同修大型類書《三教珠英》於內殿，時稱“珠英學士”。《唐會

要》卷三六記述了這一情況並列有二十六個預修者的名單。《郡齋讀書志》卷二〇載崔融編集預修《三教珠英》者四十七人所賦詩爲《珠英學士集》五卷，但未列出四十七人的姓名。據今存《珠英學士集》殘卷及《新唐書·李適傳》、《唐詩紀事》卷六，可知在這二十六人之外，尚有李適、胡皓、劉允濟、喬侃四個預修者。上述已知姓名的三十個珠英學士中，僅李處正、蔣鳳二人無詩作存世。中宗即位後，聽從上官昭容的建議，增置修文館（即弘文館，避皇太子李弘諱改爲昭文館，又改爲修文館）學士，並提高其地位。景龍二年（708），敕李嶠、趙彥昭等四人爲修文館大學士，崔湜、李適、李乂、劉知幾等八人爲學士，薛稷、宋之問、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徐堅、韋元旦、徐彥伯、劉允濟等十二人爲直學士。這個二十四學士的名單，見於《新唐書·李適傳》、《唐會要》卷六四、《唐詩紀事》卷九。此外，據兩《唐書》本傳記載，張說、蘇頌、崔日用也曾任修文館學士，大概是後來又增補的。以上修文館學士凡二十七人，均有詩作傳留至今。除學士外，“文章四友”（李嶠、蘇味道、杜審言、崔融）中的蘇味道、崔融，也是武則天、中宗朝宮廷詩苑的重要人物。

初唐宮廷詩苑又是當時的詩歌創作和詩藝交流中心。唐太宗“少尚威武，不精學業”（太宗《答魏徵上〈群書理要〉手詔》），唐建國之後，爲了使自己“致治稽古，臨事不惑”（同上），很重視自身文化素養的提高，於是除“銳意經籍”外，還熱衷學詩。他令諸學士輪番宿直，聽政之暇，即引入內殿，或“討論墳籍”，或吟詠唱酬（參見李百藥《封建論》等）。當學士、重臣“出侍輿輦，入陪宴私”（《唐會要》卷五七）時，君臣間也常作詩唱和。另外，學士、重臣之間宴飲賦詩的風氣也很流行（例如在安德公楊師道山池、于志寧宅的宴集），這樣便形成了貞觀朝宮廷詩創作的盛況。高宗朝宮廷詩的創作也未衰減，許敬宗、上官儀等宮廷詩人在當時都有很大影響。尤其是上官儀，詩作“綺錯婉媚”，風靡一代，“時人謂爲上官體”（《舊唐書》本傳）。麟德元年（664），他由於政治原因被殺，但上官體的流行並沒有因此而停止，從元萬頃、劉禕之等高宗朝宮廷詩人的作品中，就可看到上官體的影子。則天朝的珠英學士們在修撰《三教珠英》的過程中，每每“賦詩聚會”（《舊唐書·徐堅傳》），創作活動活躍，故有崔融集其所賦詩爲《珠英學士集》。學士、宮廷詩人們還

常侍從武則天宴游，君臣作詩唱和。如久視元年（700）武則天遊石淙，賦七律一首，應制奉和的除宰相、武則天的子姪、內寵外，有學士、宮廷詩人李嶠、蘇味道、崔融、閻朝隱、薛曜、徐彥伯、于季子、沈佺期等。今存的《宋之問集》中，也有不少陪侍則天的應制詩，如《龍門應制》、《麟趾殿侍宴應制》、《上陽宮侍宴應制得林字》、《扈從登封告成頌》、《松山嶺應制》等。中宗朝的宮廷詩創作更是盛況空前。中宗好宴享遊樂，“凡天子饗會遊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帝有所感即賦詩，學士皆屬和”（《新唐書·李適傳》）。當時君臣宴遊唱和的規模之大，次數之頻繁，以及製作出的詩篇數量之多，都遠遠超過太宗、則天朝。在學士賦詩屬和時，還每“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優者賜金帛”（《通鑑》卷二〇九），形成了宮廷賽詩。初唐宮廷詩人們在賦詩聚會時，也從事詩藝交流。他們先後寫出的若干探討分析詩歌的聲律病犯、對仗技巧以及藝術表現的論著，就是從事這種交流的產物，律詩的定型也是他們在從事這種交流中完成的。

宮廷詩苑存在於京師，而京師由於具有各種優越的條件，很自然地成為一個詩歌傳播的中心（說詳後）。我們知道，唐代詩歌的流佈，主要依靠傳寫^[2]。在這樣一個詩歌的流佈主要依靠傳寫的時代，詩歌傳播中心對於詩歌發展的作用，既不同於印刷術已普及的宋代，更大異於今日。在今日，一個詩人的傑作一旦發表，就立刻能在全國產生影響，不論他居於何地；在宋代，一個詩人的佳製一旦刊印，也能迅速傳至全國各地並發生影響，盡管他遠離詩歌傳播中心。而在唐代，一個詩人如果遠離傳播中心，那麼即便他佳作迭出，也難以立即在當世獲得普遍的聲譽與廣泛的影響；而長期居於傳播中心的詩人，情況正與此相反。所以，唐代詩人在當世詩壇的地位與影響，不全由其作品的質量決定。

初唐宮廷詩苑由於居於詩壇的中心地位，加上得到帝王的扶持，因而影響巨大，對當時詩壇起着支配的作用。當時詩壇公認的領袖和代表人物，無一不是宮廷詩苑中人。如武德、貞觀朝的詩壇領袖和代表人物是虞世南、李百藥、褚亮。時人稱虞世南“文為辭宗”（太宗語，見《舊唐書·虞世南傳》）、“雕文絕世”（褚亮《十八學士贊》）、“博通萬句，對問不休”（盧照鄰《南陽公集

序》); 謂李百藥“海內名流, 莫不宗仰。藻思沉蔚, 尤工五言”(《大唐新語·文章》), 其詩“雖樵童牧豎, 並皆吟諷”(《舊唐書》本傳); 評褚亮“雖未連衡兩謝(謝靈運、謝朓), 實所結駟二虞(虞世基、世南兄弟)”(元兢《古今詩人秀句序》)。高宗朝的詩壇領袖是許敬宗、上官儀。許敬宗武德初即任秦府學士, 夙已“槐市騰聲”(《十八學士贊》), 高宗朝累任宰相, 以“文學宏奧”(《舊唐書》本傳)主持大量類書、詩文總集的修撰, 成為文壇宿老、宗師; 上官儀的詩作為時人競相效仿, 前已述及。武則天、中宗朝的詩壇領袖和代表人物是“文章四友”和沈佺期、宋之問。張說《五君詠·李趙公嶠》: “李公實神敏, 才華乃天授……故事遵臺閣, 新詩冠宇宙。”《新唐書·李嶠傳》: “嶠富才思, 有所屬綴, 人多傳諷。”“為文章宿老, 一時學者取法焉。”可以說李嶠是當時詩壇的領袖。沈、宋年輩晚於“四友”, 但詩作“如錦綉成文”(《新唐書·文藝傳中》), 屢次在宮廷賽詩中獲勝, 成為當時宮廷詩苑的寵兒。

初唐時處在宮廷詩苑圈子之外的詩人不多, 較有詩名的只有王績、四傑、劉希夷、陳子昂等幾個。由於他們都不居於詩壇中心, 所以在當世詩壇也未能獲得應有的地位與影響。如自隋入唐的王績獨標一格, 在武德、貞觀朝詩人中存詩數量最多(今存詩一百二十四首), 但他長期居於故鄉絳州龍門, 與詩壇中心(宮廷詩苑)疏離, 因而在當世影響不大, 在詩界也未能獲得應有的地位(唐陸淳《刪東臯子後序》: “其遺文高迹不顯。”)。可以說, 他的詩在身後纔逐漸為人們所注意。《大唐新語·文章》稱劉希夷“少有才華”, “不為時所重”, “後孫翌撰《正聲集》, 以希夷為集中之最, 由是稍為時人所稱”。希夷約卒於儀鳳四年(679), 《正聲集》編於開元中期, 是希夷在辭世四十餘年後, 方為人們所注意。這同他一直遠離詩壇中心(希夷未在京師做過官), 應有關係。陳子昂雖曾任職京師, 與一些宮廷詩人也有往來, 但始終沒有進入宮廷詩苑的圈子。他懷着對宮廷詩風的深刻不滿, 大力標舉興寄、風骨, 倡導詩文革新, 可是在當世產生的影響却很有限, 盧藏用《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說: “惜乎! 湮厄當世, 道不偶時……恨不逢作者, 不得列於詩人之什, 悲夫!”直到盛唐時代, 其聲名、影響始著^[3]。

駱賓王、盧照鄰、王勃、楊炯並稱“四傑”大約在高宗咸亨(670—673)、

上元（674—675）年間。在並稱“四傑”之前，他們各自己都在京師獲得了聲名。“四傑”之得名京師，與宮廷詩苑有一定關係，但他們又都不能算是宮廷詩苑中人^[4]。下面擬從關於“四傑”次第的爭議，來看一看詩壇中心（宮廷詩苑）的作用。景龍二年（708）宋之問所作《祭杜學士審言文》中有“王楊盧駱”的次第，《舊唐書·楊炯傳》稱楊對這一次第表示不滿，“謂人曰：‘吾愧在盧前，耻居王後。’當時議者，亦以爲然……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炯與照鄰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張）說曰：‘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既優於盧，亦不減王。耻居王後，信然；愧在盧前，謙也。’”不管楊炯爭次第的記載是否符合事實，當時當有楊應排名第一的呼聲。杜甫《戲爲六絕句》其二：“楊王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杜列楊爲“四傑”之首^[5]，想來淵源有自，而非別出心裁。從今存的作品看，楊的文學成就實難居四人中的首位，爲什麼當時却有人認爲他應排名第一？楊炯十一歲（660年）時開始“待制弘文館”，上元三年（676）補校書郎；永淳元年（682），受到與上官儀“文章款密”、兼任弘文館學士的宰相薛元超的舉薦，任太子詹事司直，兼崇文館（屬東宮，比照門下省之弘文館而設）學士，同時任學士的有崔融、徐彥伯（見楊炯《庭菊賦》）；天授元年（690），與宋之問同值習藝館，並結爲知交（見宋之問《祭楊盈川文》）。在“四傑”中，楊炯同宮廷詩苑中人的關係最爲密切。從楊炯今存的詩歌看，也帶有較多宮廷詩的印記，駱祥發《初唐四傑研究》謂其“在宮廷詩圈子裏掙扎”，不爲無據。在宮廷詩苑支配詩壇的情況下，人們認爲楊炯應排名第一是很自然的。

初唐近百年中，當一批宮廷詩人辭世後，又有一批新的宮廷詩人取而代之，宮廷詩苑始終存在，並成爲當時詩壇的中心。到了玄宗開元年間，這種局面纔有了大的改變。雖然當時宮廷的宴飲賦詩活動不絕，但宮廷詩苑已喪失其對詩壇的支配力，再也不能成爲當時詩壇的中心了。初唐宮廷詩苑之所以能成爲當時詩壇的中心，不僅僅由於它得到帝王的扶持和處於優勢的地位，更主要的還在於，它對初唐詩歌的演進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從而對當時詩壇產生較大的影響力。余恕誠《唐詩風貌》一書指出，初唐詩歌是在宮廷內外雙方的互補中演進的，“初唐詩歌演進，始終離不開宮廷詩苑這樣一個最爲重要而持久

的基地”。這個看法頗有見地。竊以爲初唐宮廷詩苑起碼擔負並完成了兩項宮廷詩苑圈子之外的人難以擔負和完成的促進詩歌發展的任務。第一項任務是誘導學詩、傳授作詩技藝、普及詩歌創作。弘文館學士（宮廷詩苑的主力）職“司撰著”（《唐六典》卷八），他們在整個初唐時代，連續編纂了大量類書、詩文總集等，爲文人士子學習詩文、采摭辭藻典故提供便利，起到了誘導人們學詩的作用（參見聞一多《類書與詩》）。宮廷詩人們還撰寫論著，如上官儀作《筆札華梁》，元兢作《詩髓腦》，崔融作《唐朝新定詩格》等，對詩歌的聲律、對偶、藝術表現等進行分析探討，於文人士子學習作詩和詩歌創作的普及都產生了促進的作用。還有像李嶠作詠物組詩《雜詠詩》一百二十首，爲習詩者提供了便於效仿的範式，也起到了普及詩歌創作的的作用（參見葛曉音《創作範式的提倡和初盛唐詩的普及》，載《文學遺產》1995年第6期）。又，弘文館學士有“兼訓生徒”之責（弘文館有學生三十人，皆皇親國戚及功臣貴官之子），這使學士們能夠通過“講學授徒”的方式傳授作詩技藝，從而也有助於詩歌創作的普及。隨着開元之世文教的昌盛，來自庶族寒士階層的詩人大量湧現，標誌着這第一項任務已基本完成。第二項任務是律詩的定型。律詩定型於武則天、中宗朝的珠英學士、修文館學士們之手，說見拙作《論律詩定型於初唐諸學士》（載《文學遺產》2000年第1期）。在以上兩項任務已完成的情況下，宮廷詩苑的作用與影響力也就大爲減弱。另外，經過“四傑”、陳子昂等對宮廷詩風的激烈批評，宮廷詩存在風骨不揚的缺失到開元時已成爲人們的共識，於是時代的審美文化取向便同宮廷詩的審美風尚拉開了距離，宮廷詩也就逐漸失去對人們的吸引力。這樣，宮廷詩苑自然也就難以成爲當時詩壇的中心了。在開元之世，事實上已很難找到嚴格意義上的宮廷詩人。例如張說（667—731），原是武則天、中宗朝的珠英學士、修文館學士，所作宮廷詩近百首，似乎是一個宮廷詩人；然而他閱歷豐富，寫的非宮廷詩更多，達二百多首，且作品所追求的氣象，亦異於宮廷詩，如他的某些應制之作，甚至具有雄勁的格調，所以又不能算是一個宮廷詩人。可以說，宮廷詩的創作集團到開元時已經瓦解。這是唐代詩歌發展的必然趨勢，詩國高潮到來的標誌。

二

開元以後，西京長安成爲唐代一個首要的詩壇中心。首先，長安是唐代文人士子聚集的中心，也是詩人薈萃的中心。這可從以下四個方面加以說明：第一，長安有數量衆多的官員。據《新唐書·百官志》統計，唐中央機構的流內文官約有一千五百人，在西京的京兆府及長安、萬年二縣（西京所在）的流內官有五十八人。流外文官更遠遠超過此數，如尚書省流內官一百六十七人，流外官達一千二百一十二人。此外，任武職的人中也不乏文士，如詩人岑參曾任右內率府兵曹參軍，杜甫曾任右衛率府胄曹參軍等等。第二，在長安國學就讀的生徒甚多。據《新唐書·選舉志》載，國子監六學生徒有二千二百一十名，弘文、崇文館生有五十名，加上廣文館（天寶九載置）生六〇名，崇玄學（開元二十九年置）生一百名，共二千四百二十名。但安史之亂後學生數量減少。此外，京兆府學及長安、萬年縣學共有生徒一百八十人。第三，每年有衆多舉子入京應試。唐代科舉分常舉與制舉兩種，常舉每年舉行，主要有進士、明經兩科。《通典》卷一八說：“我開元、天寶之中，一歲貢舉，凡有數千。”謂每年參加進士、明經兩科考試的人達數千名。這些參加科舉考試的舉子，一般要在長安居留五個月左右（舉子例於每年十月集於京師，至第二年二月間方放榜），更有不少舉子落第後留居長安修業習文，以期來年再試。又，制舉雖非每年舉行，但應者亦不在少數，《通典》卷一五說，開元以後應制舉者，每次“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第四，每歲赴京參加吏部流內文官銓選的“選人”成千上萬。這些“選人”共包括四類人，一是任職期滿或因故停職的官員，二是常舉及第後尚未授官的士人，三是門蔭出身獲得參選資格的人，四是流外出身獲允參選入流的人。《通典》卷一七載開元三年（715）張九齡上書稱，“今則每歲選者，動以萬計，京師米物，爲之空虛”。唐時銓選，“始於孟冬，終於季春”（《通典》卷一五），則衆多“選人”需滯留於長安的時間之長，更超過入京應試的舉子。此外，長安還有不少各府州赴京出差辦事的官員以及入京遊覽觀光、尋求出仕門路的士人。隨着唐代詩歌創作的普及，在上述各類

文士中，當會有許多詩歌作者。宋蘇轍就曾說：“唐朝文士例能詩。”（《題韓駒秀才詩卷一絕》）所以長安不僅是一個文人士子聚集的中心，也是一個詩人薈萃的中心。

衆多詩人匯聚於長安，自然要從事詩歌創作與詩藝交流活動。我們知道，唐詩中多贈答、唱和、送別、宴集、題詠勝境之什^[6]，而長安正是有很多聚會、宴飲、餞送、登臨游覽等作詩場合的地方；又，詩人們既聚首京師，則新知故交間互示篇什、切磋詩藝便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可以說，長安又是一個詩歌創作和詩藝交流的中心。更爲重要的是，長安還是一個詩歌傳播的中心。在京詩人們的互示互贈詩篇，應舉進士的投行卷（考試前向公卿名流呈獻自己的詩文）與納省卷（考試前向試官交納自己的詩文），都使得詩歌得以“發表”和流傳。長安麀集着大量公私歌妓樂工，她們將當代詩歌配曲演唱，也促進了詩歌的傳播。由於京官的出使和外放、生徒的修業期滿、舉子的還鄉、“選人”的離京等原因，使得聚集於長安的文人士子具有很强的流動性，他們既能將自己與他人的詩作帶入京師傳播，又能將自己在長安獲得的詩歌及時地傳向四方。唐人對詩人的作品是否傳於京師很看重^[7]，因爲詩作一旦傳於京師，也就能够較迅速地傳向全國各地並獲得聲名。

東都洛陽是唐代又一個詩壇中心，當然其地位不如長安重要。洛陽成爲另一個詩壇中心的條件，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洛陽也是一個官員甚多的地方。那裏設有分司（分設在東都的中央機構）官、東都留守官屬以及負責管理東都宮苑的官員，官吏的數量較長安以外的任何一個府州爲多。又太宗、高宗、武則天、中宗、玄宗屢幸洛陽，合計共居洛陽四十四年。當皇帝居洛陽時，大批官員自然會隨從而至。第二，東都也設國子監六學、廣文館、崇玄學，各有生徒。第三，科舉考試和吏部銓選有時在東都舉行。第四，洛陽是唐代的重要交通樞紐，河南、河北、淮南、江南道諸州的文人士子入京，一般都要經過洛陽。由於具備上述條件，洛陽於是成爲又一個詩人薈萃和詩歌傳播的中心。

開元以後的詩人是否居於京、洛詩壇中心，會對其作品在當世詩壇的地位與影響產生作用。下面舉若干比較典型的例子加以說明。

李白是公認的詩國巨人，但在當時詩壇的地位與影響却不如王維。寶應二年（763）正月，王維卒後約一年半，其弟王縉應詔搜集編錄成《王右丞集》呈進，代宗作答詔說：“卿之伯氏，天下文宗，位歷先朝，名高希代……詩家者流，時論歸美，誦於人口，久鬱文房。”約作於德宗建中（780—783）年間的高仲武《中興間氣集》卷上“錢起”也說：“文宗右丞，許以高格；右丞沒後，員外爲雄。”都指出王維在盛唐詩壇獲得了“天下文宗”的地位與世所稀有的高名。大曆七年（772），獨孤及作《唐故左補闕安定皇甫公集序》說：“沈宋既歿，而崔司勳顥、王右丞維復崛起於開元、天寶之間，得其門而入者，當代不過數人。”《全唐文》卷四四七寶泉《述書賦》寶蒙（泉之兄）注也說：“二公（王維、王縉）名望，首冠一時。時議論詩，則曰王維、崔顥；論筆，則曰王縉、李邕。”都稱王維爲盛唐詩人的代表和當時最有名望的詩人，而未提及與王維同齡的李白。成書於天寶末年的殷璠《河嶽英靈集》選錄李白詩十三首、王維詩十五首，評曰：“白性嗜酒，志不拘檢，常林栖十數載，故其爲文章，率皆縱逸。至如《蜀道難》等篇，可謂奇之又奇。”“維詩詞秀調雅，意新理愜，在泉爲珠，著壁成繪，一句一字，皆出常境。”對王維的評價明顯高於李白。《英靈集》卷首的《序》說：“粵若王維、昌齡、儲光義等二十四人，皆河嶽英靈也，此集便以‘河嶽英靈’爲號。”亦列王維爲盛唐詩人之首而不提李白。之所以出現上述現象，當與王維長期居於長安這一詩壇中心而李白則不是這樣有關。

開元三年（715），王維十五歲，即離家赴長安，謀求進取，在那裏居留約五、六年，於開元九年（721）應進士試及第。在登第前居長安的幾年裏，他常游歷於寧王、岐王等豪貴之門，並以詩才獲得聲名（參見兩《唐書·王維傳》、唐薛用弱《集異記》）。當王維在長安已得詩名之時，李白尚僻居蜀中，到了開元十三年（725），始出蜀東游。又至天寶元年（742）秋，他被玄宗徵召，纔獲機會進京^[8]。而王維自登第後至天寶元年，則有近十年時間居於長安（參見拙作《王維年譜》）。李白入京後，大概由於受到賀知章、玉真公主的稱譽、力薦，玄宗於是親自召見他，給予特殊恩遇，“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李陽冰《草堂集序》）。這一來，李白的聲譽自然聳動京師，詩名也

因此而遠播。但他居長安不到兩年，即被“賜金放還”。天寶三載（744）春，李白離開長安，開始了新的漫遊生活。從這時起直到寶應元年（762）辭世，詩人再未進過長安。自離京後，李白的創作進入了一個更為重要的時期。可以說，他後期（離京以後）詩歌的總體成就超過前期（離京以前）^[9]。但後期李白離開長安這一詩壇中心，詩作不易迅速流佈全國並產生廣泛影響。這時候，雖有少數知交、崇拜者（如杜甫、李陽冰等）對他的詩歌給予極高評價，却未必能獲得當時詩壇的普遍認同。而王維自天寶元年至上元二年（761）辭世，一直居於長安（其間有一年多時間“陷賊”），故而其詩作得以迅速流佈全國。大曆元年杜甫作《解悶十二首》，其八云：“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蔓寒藤。最傳秀句寰區滿，未絕風流相國能。”稱當時王維詩在全國流傳最為廣泛，正因此，所以王維“天寶中，詩名冠代”（《舊唐書·王維傳》）。

李白的詩文，最初有魏顥於上元二年以後編集的《李翰林集》，僅二卷；又寶應元年李白臨終前授草稿於李陽冰，陽冰為編錄成《草堂集》，凡十卷。貞元六年（790），李白卒後二十八年，劉全白作《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稱李白“文集亦無定卷，家家有之”。元和十二年（817），李白卒後五十五年，范傳正又編成李白文集二十卷。這些文集雖都未全備，但隨着它們的編集行世，李白詩歌到貞元、元和時大抵已得到廣泛流傳（所謂“家家有之”）。這時候，李白在唐人心目中的地位纔高於王維。孟郊《戲贈無本二首》其一云：“可惜李杜死，不見此狂痴。”韓愈《醉留東野》：“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調張籍》：“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皇甫湜《題浯溪石》：“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概。”這些詩都作於貞元、元和間，由它們不難看出，當時李杜並稱，都被尊崇，獲得了在詩界的至高地位。這時雖有元稹、白居易的抑李揚杜之論，但他們也並不否認李杜並稱以及李白在詩界的崇高地位，不過給予杜詩以高過於李詩的評價罷了。

再以偉大詩人杜甫為例。論者多謂杜甫生前寂寞，詩名不顯，這話說得是否準確，需作一番辨析。自天寶五載（746）後，杜甫寄居長安這一詩壇中心近十年，照理說他的詩作應該得以廣泛流佈，然而編於天寶末選入盛唐詩人二十四個且選錄標準又掌握得比較好的《河嶽英靈集》却不收杜詩。《英靈集》